

10月14日至24日，“中国记忆——智利画家何塞·万徒勒里摄影及速写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全面展示了画家笔下跨越时间和距离的艺术共鸣与情感相通。

在拉丁美洲，人们把何塞·万徒勒里与墨西哥著名艺术家迭戈·里维拉、大卫·西盖罗斯等人并列。在绘画成就有口皆碑之外，万徒勒里为推动智利与中国友好往来而缔结的文化交流纽带，至今仍牵动着两国人民的心灵。

文化旅者 跨越山海

1988年9月，万徒勒里逝世，享年64岁。

万徒勒里的一生，步履不停。1924年，他出生在圣地亚哥。父亲是一位来自意大利古城拉文纳的工程师，胸怀在祖国无法被理解的社会主义理想，先后辗转巴西和阿根廷，最终定居智利。父亲坚定的革命理想和对文学音乐的热情，将正义和艺术的种子深埋于万徒勒里心中，指引他走向一片更为广阔的天地——绘画艺术。

14岁时，万徒勒里参加智利大学美术学院的学习班。1940年，他结识了当时正在智利进行访问的大卫·西盖罗斯，这位被称为“墨西哥壁画三杰”之一的艺术家正为智利奇廉墨西哥学院创作系列壁画，以纪念两国人民的民族解放历史，万徒勒里幸运地成为他的助手。与西盖罗斯共事的这段经历令他意识到，“艺术创作是一种战斗方式，是对我们的材料、我们的思想，乃至我们自身的改造。它是一种斗争形式。”从那时起，这样的艺术理想和创作信念深深植根于年轻的万徒勒里心中。随后，他开始接受更多专业培训。

20世纪40年代初，万徒勒里获得奖学金，前往巴西交流。在那里，他不仅举办了首次个人画展，还得到巴西著名画家坎迪多·波尔蒂纳里的指点。回到智利后，万徒勒里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聂鲁达的诗集《坎托将军》和长诗《马丘比丘之巅》创作插图。“万徒勒里为我的诗作加入了动人的插画”，聂鲁达曾不止一次表达他对这位年轻艺术家的欣赏和喜爱。

1950年，万徒勒里来到墨西哥，之后受邀前往欧洲。在德国柏林，他参加了世界青年与学生和乎联欢节，正是在这次活动中，诗人萧三邀请他访华，万徒勒里于是成为第一位应邀访问新中国的智利艺术家。1974年，他来到瑞士日内瓦，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国际劳工组织等绘制海报，继续绘画创作并多次举办展览。

在用步履丈量世界的同时，万徒勒里独具个人风格的美学表达和绘画创作也成为那个时代的见证和记忆。他的画作，伴随他的足迹遍布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大批革命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中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曾任古巴哈瓦那大学校长的胡安·马里内略评价道：“他的优雅风度和聪明才智让他痛苦和希望之间找到了平衡……成为他那个时代卓越的历史学家。”

艺术交融 丹青为证

1952年，万徒勒里与妻子迪莉娅·巴劳纳以及当时才1岁的女儿和平移居北京。他们起初打算停留3周，结果变成了3个月，之后更长长达数年。万徒勒里结识了当时著名的中国艺术家、文学家，并受邀参加由齐白石主持的艺术研讨会。对于中国艺术家而言，万徒勒里的创作风格色彩鲜艳、情感强烈，令人耳目一新。万徒勒里则对中国绘画兴趣浓厚，他曾在笔记中写道：“中国艺术让我重新认识和思考绘画是什么。”他称赞齐白石为“中国的瑰宝”，并为自己有幸成为他的朋友而倍感荣幸。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迎来重要发展契机，经历着深刻变革。万徒勒里以艺术家的敏锐，见证并记录下这些重要的历史时刻。万徒勒里的画作，尤其是版画，纯真质朴、鲜活热烈，极富感染力，很快就在当时的中国绘画界引起关注。他独特的艺术表达使他成为首个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展览的外国艺术家。此外，他还曾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启发学生通过绘画探寻表达本民族文化特色的方式和语言，宋纯德、吴光宇等许多杰出的中国现代艺术家都是他的学生。

在参与激动人心的新中国建设事业的同时，这片土地上的生活和社会变革同样丰富了万徒勒里的艺术创作。他创作的版画《农家女孩》，生动刻画了一位正在放牧的中国乡村少女，她身着20世纪60年代的典型中国服饰，表



《长江》

情自信而愉快。女孩身后的山峦和天空飞过的群燕，已经能够看出中国水墨画的笔法。这一时期，万徒勒里创作的版画不仅线条更加精巧柔和，也使用更多曲线，并加入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花纹，画面色彩更加丰富，中国传统靛蓝和鹅黄被大量运用到作品之中。

在人物肖像之外，万徒勒里也热衷于描绘中国山水。他于1954年创作的《长江》借鉴了中国水墨丹青技法，整幅画作视野开阔，体现出中国水墨画的朦胧、婉约与诗意。他在客居瑞士期间的画作同样展现中国水墨画开阔的构图、精巧的线条和独具一格的东方美学。画作《归来》通过南飞的归雁、孤寥的渔船和茫茫无尽的海面，让观者感受到一种难以诉诸语言、始终萦绕心头的乡愁。

两种美学，两种文化，持续在万徒勒里的画作中相遇并相互印证中智两国人民和两种文化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

和平使者 情谊绵长

万徒勒里是艺术家，同时也是中智友好交流与世界和平的推动者。1952年，万徒勒里与聂鲁达以及时任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等智利政治、文化界名人共同创办了拉美地区第一个对友好组织智利—中国文化协会，为两国在1970年建交发挥了积极作用。次年，他作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副秘书长常驻北京，为增进各国人民相互了解、维护世界和平做了诸多有益工作。

不仅如此，万徒勒里的妻子迪莉娅在第一次来到中国后不久，便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西班牙语，为我国培养第一代西班牙语工作者并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互通与友谊作出了积极贡献。他们的女儿和平自幼生活在中国，直到9岁才开始学习西班牙语。在小学和初中阶段，和平分别就读于东交民巷小学和北大附中，不仅会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而且熟悉中国文化。

在父亲的画作中，和平一身红衣，扎着两个蝴蝶结，坐在小板凳上，这个睁着大眼睛的智利女孩已经完全融入中国生活。由于父母对于中国传统医学的信任与推崇，和平对医学产生极大兴趣。回到智利后，她又在中国政府的帮助下再次来华学习针灸。后来，她辗转日内瓦继续医学学习，最终在哈瓦那完成学业，为中国针灸的国际学术交流和传播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父亲每每哮喘病发，和平想到的都是针灸。旅居瑞士时，她还曾求助中国大使馆，专门协调了一支针灸医疗队为万徒勒里治疗。

如今，万徒勒里丰富的艺术创作同他与中国的故事共同穿过时间的长河，跨越山海的阻隔，持续为中国和智利，乃至中国和拉丁美洲之间的绵长情谊谱写新的篇章。

2016年，在中拉文化交流年框架下，万徒勒里的40件作品重返他曾任教的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这些作品包括他在智利和瑞士创作的25幅绘画，以及在中国创作的15幅素描、水彩和版画。2019年，中国画家冯少协 and 万徒勒里的画作，作为两种文化之间交流和对话的象征，在智利米斯特拉尔文化中心进行展出。今年，万徒勒里的摄影及速写展在中国美



《庐山》

《归来》

本文图片均为万徒勒里绘，邹萍提供

术馆举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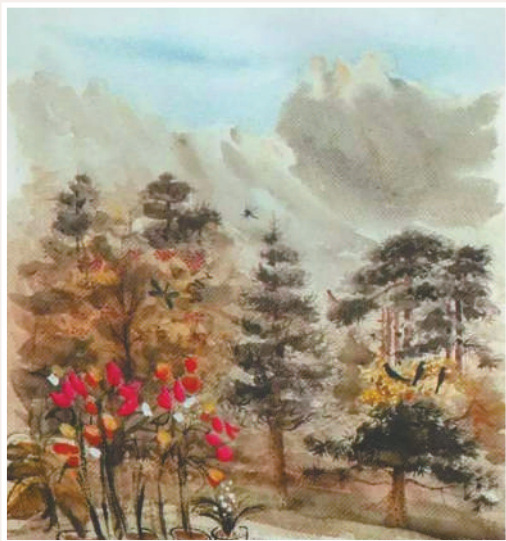
万徒勒里与中国的相遇是艺术的交汇，是友情的开始，也是人类和平理想的又一次重逢。他的画笔超越了空间，定格了时间。他是跨越国界的艺术家与文化旅者，更是友谊与和平的使者。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道同者，更以山海为证。

（作者为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副教授）

《和平的肖像》

智利画家万徒勒里的中国记忆

邹萍



传承友好精神，永固和平“金桥”

——追忆池田大作先生

董世国

近日，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著名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在东京逝世，享年95岁。池田大作生前积极致力于中日友好，为两国关系重建和发展作出了贡献，是中国人民信赖和尊重的老朋友、好朋友。

池田大作1928年生于日本东京。1947年，19岁的池田大作参加日本创价学会第二任会长户田城圣的座谈会，由此加入学会，并在户田城圣提携下成为第三任会长。1968年9月，池田大作发出尽早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倡议，呼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广泛推进中日经济、文化交流。他说：“不能忘记日本军部对中国的侵略历史，绝对不能重复过去那样的历史，一定要友好下去。”

1972年9月，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1974年5月，池田大作首次来华访问，他在书面讲话中表示“愿在中日两国之间架设通向和平的‘金桥’，并在永久的基础上进行真心诚意的对话”。同年12月池田大作第二次访华期间，因病住院的周恩来总理不顾医疗小组反对，亲切接见了池田大作。多年后，池田大作时常深情地回忆起这次“一期一会”的历史性会见：“周总理在展望21世纪时对我说过，20世纪的最后25年，对世界是最重要的时期。全世界要站在平等的立场上互相尊重，互利互惠。周总理还以充满气魄的声音明确地说，‘希望能早日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周总理的亲切话语，至今仍萦绕在我的脑海。”

池田大作创办的创价大学是日本最早接纳新中国公费留学生的大学。1975年，池田大作亲自担任保证人，邀请新中国首批6名公费留学生前往创价大学留学。

池田大作同中国朋友一道，长期不懈推进两国学术、教育、文化和青年交流，先后获得中国艺术贡献奖、中日友好“和平使者”称号、“人民友好使者”称号、中国文化交流贡献奖、“中日友好贡献奖”以及百余所中国高等院校名誉教授和名誉博士称号。池田大作在日本积极推广敦煌艺术等中国文化，他说：“敦煌莫高窟是世界佛教艺术最伟大的宝库，她属于中国人民，也属于

全人类。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他积极致力于推进两国青年交流，1968年提议邦交正常化时曾呼吁，无论日本青年，还是中国青年，都应携起手来，面带笑容地共同建设光明的世界。1990年他在北京大学发表题为《教育之道、文化之桥——我的一点思考》的演讲时呼吁，“无论两国之间发生何种纠葛曲折，我们都决不能切断友好的纽带”。池田大作鼓励访华的创价学会青年们说：“在各地吸收中国的进取精神和气息，加深友情与信赖，以正确的史观构筑日中友好的‘金桥’，构筑充满希望的‘未来’。”

2013年1月，在中日关系陷入困局的严峻形势下，池田大作公开撰文，呼吁“缓和紧张，密切日中关系”。他在文中表示，1968年9月自己提议中日邦交正常化时坚信，“没有与邻国的友好，日本就没有未来，没有稳定的日中关系，就难以实现亚洲和世界的和平”；1974年12月访华，见到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副总理，更加坚定了决心，那就是为了让战争悲剧不再重演，我们必须要建立一座两国民众之间永不断裂的友谊之桥。“每一滴让两国友好关系更加深厚的心血都是通过日中民众面对面、心连心的交流培育出的友情结晶。这种友情无论面临怎样的考验和困境都不会枯竭，反而让人倍加珍惜。”这篇文章对日本社会各界在对华关系上的态度产生重要影响，为两国关系转圜改善增加了民意基础。

哲人其萎，德业犹存。池田大作矢志不渝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对世界和平的珍视、对人民友好的渴求贯穿他的一生，直到生命终点。他以实际行动做到了将两国先辈不辞辛劳、呕心沥血建立的友好关系传承给年轻一代。他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曾与世界众多哲学家和政治家通过对话交流思想，为人类社会贡献智慧。他是著名的桂冠诗人，一生创作的众多诗作赢得广泛赞誉。他的渊博学识、真知灼见和政治胆识所体现的大家风度，以及虚怀若谷、温润真挚的待人之道，令熟悉他的中国友人至今难忘。

（作者为国际问题学者）

聆听瓷器的历史回响

黄培昭

不久前，身着中国传统服饰的景德镇瓷乐队成员们手握瓷瓶、瓷二胡、瓷琵琶和瓷笛，奏响令人陶醉的旋律，为埃及观众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视听盛宴。当地媒体评论称：“这场音乐会不仅是艺术演出，更是一场以中国瓷器为主角的文化交流与对话。”

中国与中东地区的瓷器往来可以追溯至丝绸之路贸易鼎盛时期。9世纪后，中国瓷器进入“大外销”时代。唐代，连通东南亚和西亚的海路开通，中国商人将瓷器运至东南亚，阿拉伯商人前往东南亚或直接来到中国采购，然后将其运抵波斯湾、埃及和叙利亚等地。20世纪50年代，埃及考古队在首都开罗福斯塔特古遗址发掘出数十万件瓷器碎片，其中许多来自中国，成为中国和埃及历史上贸易联系紧密和文化交融互鉴的实证。

在伊朗国家博物馆，笔者有幸见到馆藏的32件中国青花瓷器，它们器形硕大、花纹清丽、工艺精湛，被博物馆视为珍宝。博物馆前馆长卡格自豪地说，伊朗是全球保存完好的青花瓷第二大收藏国。目前，伊朗18家博物馆藏有中国瓷器800多件，其中包括宋、元、明、清时期的瓷器珍品，大部分经由丝绸之路来到伊朗，为当时的皇室贵族所藏。

土耳其托普卡帕宫收藏了上万件中国瓷器，青花瓷就有5000余件，其中不乏精品甚至孤品。

伊兹尼克是土耳其西部的一座古城，距离伊斯坦布尔约100公里，陶瓷是这座城市的名片。在奥斯曼帝国时期，中国瓷器广受欢迎。由于钟爱中国青花瓷，奥斯曼帝国皇室要求伊兹尼克的工匠们做出同样的瓷器，中国对伊兹尼克的影响便从那时开始。

15世纪，伊兹尼克工匠模仿中国青花瓷，制作出大量白底蓝花的陶瓷。当时，蓝色调的伊兹尼克陶瓷烧制最多，绿色也较为常见，花纹则以树叶、蔓藤和中式云纹为主。虽然有烧制陶器的经验，但当地匠人难以掌握中国技术，无法达到烧制瓷器所需温度，便将玻璃料、石英加入黏土，这种混合物的烧制温度低于瓷器的烧制温度，虽无法制成瓷器，仍能做出和中国瓷器相似的陶器。16世纪时，伊兹尼克陶瓷融入更多色彩，例如紫色、红色和黑色等，图案也更为多样，郁金香、玫瑰、柏树等形象被广泛运用。

时至今日，陶瓷依旧是伊兹尼克的象征。市中心的钟楼便以瓷砖装饰，上面绘有扬帆航行于广阔海面的轮船。这座城市记录下中国瓷器对伊兹尼克的深远影响，也见证了中国和土耳其源远流长的友谊故事。

回望历史，沿丝绸之路，中国瓷器逐渐进入中东地区，以精湛工艺和东方美感成为王室贵族的珍贵收藏，并逐渐融入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印证着中国与中东地区文化交融的悠久历史。在这重意义上，中国瓷器堪称历史的见证者。那些于历史遗址中出土的中国瓷器碎片，曾经是古代中东地区与中国之间源源不断贸易往来和文化交融的一部分，在今天，成为历史研究的宝贵物证。

旅人心语

国际副刊 logo and contact information: 本版责编:王佳可 庄雪雅 王迪 电子信箱:rmrbgjk@163.com 版式设计:蔡华伟